

# 如何摆脱多重危机？

——一种批判性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

〔奥〕乌尔里希·布兰德著 张沥元译\*\*

**提 要** | “转型”这一概念在过去几年中正变得时尚起来。在本文中，“转型”首先与前所未有的对生态危机的认识有关；其次，与当今（全球）环境治理方式日益明显的局限性有关；再次，与2008年以来其他危机维度的出现有关；最后，与围绕社会变革，尤其是社会自然关系变革的日益激烈的讨论有关。然而，“转型”这一术语本身是存在争议的，而且许多研究对转型的分析性和叙述性层面、构想性和战略性层面不加区分。本文致力于阐明一种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理解社会生态转型的方法，力争实现从理论上对转型“主体”——侧重于对政治操控进程的深入阐释——和转型“客体”更深刻的理解。笔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规制理论和霸权理论（葛兰西主义意义上）等概念，对于国家和管治理论以及社会生态关系的批判性理解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换言之，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型概念，有助于更精确地理解现实世界转型的障碍和需求。

**关键词** | 转型 规制理论 霸权理论 社会自然关系 批判性政治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 | D089

**作者信息** | 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教授。

几年前，联合国“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项目对最为紧迫的环境难题做了概述。从那时起，理解全球环境变化的核心概念是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推动者”，即“任何自然或人为诱发的、直接或间接地导致生态系统变化的因素”。但是，像“转型”这样的概念并没有被用于相关分析中，人们更多提到的是“（全球）环境变化”。

短短数年之后，世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随之改变。“转型”这一概念在社会生态讨论中日益受到关注。许多国际组织和智库的报告都提到这一概念。相应地，社会科学研究也在适应这一趋势，并且空前活跃。<sup>①</sup>

笔者在本文中阐发的是，“转型”这一表

述的运用越来越多，主要与以下因素相关：对危机多重特点的承认；全球环境治理的局限性；日渐明显的是，即便仅仅是解决多重危机中的生态危机，也需要对社会进行深刻改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国际资源小组（International Resource Panel of the UN

\* 原题为“*How to Get out of the Multiple Crisi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本文的英文版即将发表于《环境价值》（*Environmental Values*），中文版经作者同意发表，略有删节。

\*\* 译者信息：张沥元，女，1988年生，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100871。

① 围绕着“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讨论也发生在“转型”这一大主题背景之下。

Environmental Programme)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建筑材料、化石燃料、生物量(biomass)和矿物这些资源使用量的急剧增加。与此同时,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减少、海洋酸化、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和其他生态问题之间的联系,也开始被强调。这与人们意识到某种特殊危机(比如气候变化或生物多样性减少)的解决需要考虑其复杂背景有关。要从政治角度解决这些危机,需要考虑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将消极影响从一个领域转向另一个领域的危险(例如,通过工业化农业种植和驱逐农民来生产能源作物)。

基于此,奥布雷恩(K. O'Brien)主张采取适当的气候变化应对政策,并质疑“引发人为环境变化、社会脆弱性和其他环境难题的结构、系统和行为因素,以及这些因素背后的假定、信念、价值、承诺、忠诚和利益”。<sup>①</sup>因而,正如德里森(P. Driessen)等人指出的,“社会转型”概念指的是“社会的系统性特征,并且包含社会、文化、技术、政治、经济和法律层面的变革”。<sup>②</sup>

关于转型的争论,也可以视为对导向一个更加可持续世界的转型过程中的积极性案例、可能性,以及预料之外结果的更好理解,当然也包括其中遭遇的难题和障碍。对于当今和未来深刻变革的分析,不能与关于未来社会发展方向的构想性和战略性的阐述完全分离。<sup>③</sup>但是,这一概念的分析性和叙述性使用与更为构想性和战略性的使用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混淆。结果是,分析性的阐释常常被构想性的、战略性的主张所取代。因此,虽然构想性和战略性的观点不应被忽视,但它们不应导致对根深蒂固的、亟须改变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的忽视。

因此,对“转型”这一概念需要做理论上的澄清。笔者认为,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对转型进行解读是一种最为合理的方法,有助于理解现代社会实现转型的主要推动力、它们的结构性影响、行动主体的活动空间、环境议题和

其他问题是怎样得到承认的,以及关于可持续性社会的构想和战略的潜能与困难所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关于转型的唯一定义。概念,尤其当它们变得极为重要时,往往是或多或少不同观点的汇集或认知集合,只会有一个大致共同理解。此外,概念的产生不仅取决于隐晦的或明确的理论假设,还依赖于认知兴趣。当然,一个概念的有效性同时取决于它的合理性和可应用性,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使社会与社会生态现象、问题得到更好的理解。

在结构上,笔者将首先阐述社会生态转型这一综合性概念的形成,需要转型的“主体”和“客体”的更加系统的概念化(第一部分),然后将对此前的相关理论概念和路径加以阐释(第二、三部分),最后得出结论并作出展望(第四部分)。

## 一、一种综合性转型概念的先决条件

本文的首要前提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能够从两个意义上促进转型概念的形成。第一,政治掌控过程中的核心“主体”的概念化,比如国家或管治结构与进程。通常认为,发起和推进转型进程的是决策者以及决策者背后的政府或国家。在这里,国家及其管治被认为有兴趣应对公共问题、创造公共福利。

① K. O'Brien,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From Adaptation to Deliberate Transformation,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36, No. 5, 2012, p. 668.

② P. Driessen, et al., Societal Transformations in the Face of Climate Change, paper prepared for the Joint Programming Initiative Connecting Climate Change Knowledge for Europe (JPI Climate), 2013, p. 1.

③ 克里弗·斯帕施(Clive Spash)正确地坚持不使用“规范性的”(normative)一词,因为所有的思考和实践都有着规范性的基础,而且事实与价值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笔者在这里使用的形容词是“构想性的”(visionary)和“(政治)战略性的”(strategic)。

笔者已意识到,关于转型(和过渡)的著述对变革主体的理解更为广泛,比如变革施动者和先驱者。多层治理视角集中于微观层面,转型管理学派则致力于寻找“可持续发展管治的新颖模式”及其混合模式。<sup>①</sup>技术和生产效率的提升与创新、经济循环性的强化,以及价值转变为以自我限制(充足)为标志的后物质价值体系的过程,经常促成各种新选择和可能性。

第二,对于现实问题和危机背后的社会内容,即转型“客体”的特征,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从描述层面上说,它往往指的是被过度使用的全球系统,比如土地、自然资源储量、大气层、海洋等。这些难题被视为人类自身的问题,因而需要由人类来解决。其主导性论调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真理体系:自然科学负责向我们描述危机的特征。

对转型“客体”的另一种理解是“大趋势”这一概念。其中包括人口演进趋势、生产全球化、贸易和金融市场、资源密集型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化、南方国家工业化、不断增加的资源利用和价格上升、技术进步和数字化进程,等等。这里包含的假定是,这些大趋势需要加以塑造。

多层治理视角关注现存社会技术体系(比如能源、交通、住房或农产品体系)的稳定化的锁定和路径依赖,这些体系由技术、市场、政策、用户体验和文化内涵构成。它设定,激进的创新发生在微观领域,并且由有奉献精神的人士来推进。微观创新有可能带来体系甚或宏观上的改变。

基于上述背景,一种批判分析性的转型概念面临着双重挑战,一种挑战是“控制客体”的概念化,即在社会生态转型过程中变革对象的概念化(这里的“客体”是不可触摸的)。尽管发生了关于“人类纪”和由人类引发的地质影响的精彩争论,而且政治学和社会生态学领域内也存在着长期争论,但主流思维模式仍将处于危险中的全球生态系统——由自然科学来描述——与造成问题和

危机的社会体系相并列。但对社会本身、其结构和推动性力量、稳定性因素和危机、行动群体,以及它们存在的条件和行动的资源,甚或相互间的力量关系,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各种复杂的社会和社会-自然关系概念,都被所谓的“难题”“大趋势”或“人性”所遮掩。

另一种挑战是对政治驾驭或操纵的理论认知,比如对管治结构和进程的理论认知。对此,关于国家和管治的批判性研究,应该能提供更多的洞见。为此,需要与主导性甚至是支配性的社会实践、合理性、价值和话语相联系。政治驾驭或管治的结构和进程,需要理解为是与社会进程和结构,甚至与社会-自然关系共同构建的(co-constitutive)。笔者认为,这些理论概念有助于抓住这一“共构性”特征。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现实政治仍在结构上纠结于多维的、统治主导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而一种深刻的社会生态转型的构想性和战略性计划应考虑到这一点。

对于比较视角下的批判分析性转型概念,需要指出的是它的“特殊性”(differentia specifica)。它所强调的是,必须得到解决的社会生态和多重危机,受到了权力驱使和统治关系主导,并且具有霸权性和危机驱动的特征。例如,市场作为社会生产(消费、生活)关系和社会权力关系的一部分,也被视为一种历史性的特殊社会关系。这样一种视角对于解读社会关系的资本主义特征,特别是其父权制、帝国式和新殖民主义的特征都富有成效。

## 二、建构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理论概念

一种致力于理解社会和社会生态转型动力的理论,应当专注于复杂社会关系的“整

<sup>①</sup> 笔者在本文中将不使用“过渡”(transition)这个术语,但在论证中的某些阶段会提及它。许多学者认为,它与转型是可以互换使用的。

体”结构和结构化。这一理论应当能够将各种社会关系的互相交织和矛盾及导致相互间联系和社会应对矛盾能力的机制概念化。这些机制能够给予社会关系以时间上的连续性,或者不能保持这种连续性从而引发危机。对此,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能提供诸多帮助。

接下来,笔者将依次阐述对于转型概念至关重要的几个理论范畴:生产方式、资本主义规制理论、国家和管治、霸权理论。

历史唯物主义承认了同处一个时代的不同生产方式(比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以及它们的空间和时间的规定性(比如福特主义)。这些生产方式——或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再)生产和生活方式——并不能决定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它们之间还存在着竞争。在生产方式理论中,马克思指出了发展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并依此描述了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在马克思看来,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人们为了创造社会生活而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形成的关系”相一致或相适应。<sup>①</sup>这个概念侧重于社会得以从社会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从主体的意义上组织其物质基础的结构和功能——包括与自然的物质交换。它阐明了统治性社会结构和过程,以及必然性矛盾和危机驱使下的再生产。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的社会中,社会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语法”或逻辑是盈利、资本积累和资本的相关社会权力。先前投入的货币资本,需要通过带来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或者说由此导致的增殖过程来实现增长。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是在永不满足的欲望驱使下,通过更加密集或广泛的投资来增加利润而形成的。因此,积累规则对于社会转型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第一个影响是,“如果资本主义不能持续变革生产工具、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那么它就会灭亡”。<sup>②</sup>这同资本将社会关系和自然转化为商品,以及通过持续占用土

地以获得动力的趋势,如影相随。

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社会固有的变革本性相关的第二个影响,是资本制造出一种全球市场的趋势。为了解决大量的产能积累,以及经由商品和竞争得以实现的交换价值需要,资本主义开始了其世界主义的转向。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这一抽象名词,对于具体而复杂的社会关系并无多少说明。因为,这些社会关系都是历史多变的,而且同其他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无偿劳动相交织。<sup>③</sup>资本主义发展从空间和时间上说都是不均衡的,因而本质上是倾向于危机的,同样,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不均衡的。而且,它建立在一种“外部化阴影”之上。资本主义动力和增值、积累过程,尤其否定无偿的劳动和自然。这一问题常常被忽视。

不仅如此,总是有不同性质的生产方式共存,并且相互建构。比如,伦内·萨瓦莱塔(René Zavaletta)和路易斯·塔佩亚(Luis Tapia)就使用“重叠化社会”(overlapping society)这一概念,来表明不同生产方式的复杂融合确实存在。他们研究的参照点是尚未消失的、在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形成的本土族群和自给自足经济。从另一个角度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现。

这些简短而抽象的反思引导我们关注(社会生态)转型争论的一个重要维度。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问题不在于社会转型还是社会-自然关系转型,而在于其背后的主导性逻辑是什么。我们应当通过对转型

<sup>①</sup> K. Marx, *Capital*, *Marx-Engels-Werke*, Vol. 25, Berlin: Dietz, 1998/1887, p. 51.

<sup>②</sup> Ibid., p. 243.

<sup>③</sup> 并非所有的社会关系或问题性动力机制都可以置于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概念下进行解读。理论概念无法再现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资本主义概念采取了一种强有力的语法表述特征,认为其社会关系,包括社会-自然关系必然导致现代社会的危机。

的不同方法的分析来使这一问题明确化。

此外,对于批判性转型概念来说,还需要考虑时间维度,即一种综合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的历史分期。转型——作为进展中或有意为之的变革——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背景下发生,还是应当超越这个阶段?后者指的是另外一种生产方式,如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所说的“大转型”(great transformation)——他指的是转向工业资本主义,如今则指离开工业资本主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诉诸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不同研究,探讨了在资本主导的社会形态下如何理解其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问题。<sup>①</sup> 规制理论在社会理论层面上提出了如下观点:历史的、矛盾的资本主义关系,包括社会-自然关系,由于技术、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发展和社会斗争的偶然结果等原因,呈现出颇为不同的形式。<sup>②</sup>

这些多重性关系可以是暂时稳定的,并为一种相对持久的资本积累过程提供社会环境。正如我们常常从历史中看到的和正在经历的那样,资本积累也可能发生在不太稳定的条件下和危机期间。但当某些规则存在的时候,社会经济结构和进程会运行得更好。试想,对阶级和性别这样的社会结构而言,妥协和共识在较为稳定的条件下更容易达成。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再生产,不断地通过个体完全不同的战略追求和对配置性与权威性资源的不同占有状况来实现。正因如此,社会再生产仍主要是一个不确定的过程,尽管某些时期确立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能够导致某种计划性和有序性。

在更抽象的生产和更具体的社会形态(比如民族国家社会)之间的中观层面上,社会规制理论将这样一些不同程度上稳定的阶段——往往贯穿于不同的社会形态——称为“发展方式”,比如福特制。与生产方式相比,发展方式的概念更多地考虑并结合了像大批量生产和大规模消费这样的要素。

宏观经济上的聚合或趋同——一种有效

的“积累体制”,是在制度上借助“规制方式”来实现的。它包括“各种制度形式、网络、明确或不明确规范的整体性,以便使积累体制下的行为者与社会关系状态及其冲突的特点相一致”。这样一种稳态,经由广泛的社会价值分享和一定时期内以规制为形式的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而逐渐达成。博伊尔(R. Boyer)如此描述了规制方式的特点:它确保了贯穿各种具体制度形式的基本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它掌控着特定积累制度再生产的方向;它着力于确保大范围内个体和组织的分散决策过程的动态兼容性,而无须考虑整个系统的逻辑。社会关系的相对持久,不仅意味着制度的强化,也意味着个人、集体性团体(比如工会)的预期和生活实践的稳定化。<sup>③</sup>

一种或多或少稳定的发展方式——尽管仍存在某些危机和公众抗议,但社会发展的方向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构成一种“发展方式”,或者借用葛兰西的术语,一种“历史性时刻”(historic block)。对当前阶段的正确理解,对于变革战略和建议的科学评估,以及对转型的真实历史过程的分析,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所有关于绿色经济或绿色资本主义的战略和出现可能性的争论,都将从中受益。

① 大部分关于资本主义阶段划分的著作——包括在此分析的规制理论——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现实诊断上都不关注社会生态议题。考虑到现实进展,这一状况也许会发生改变。

② 这一点可以从规制的定义得以说明:“我们将‘社会关系的规制’称做社会关系被再生产出来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是充满争议和矛盾的。因此,规制概念只能在特定架构内来理解:关系—再生产—矛盾—危机。”参见 A. Lipietz, *Accumulation, Crises and Ways Out: Som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s on the Concept of Regul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8, No. 2, 1988, p. 11。

③ R. Boyer, *The Regulation Schoo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社会驾驭的规制主义的概念化是对国家的一种更加综合性的理解,并非仅仅是在“掌控”社会——就像在政府或国家或者管治方式中那样。<sup>①</sup>在批判性可持续性研究中,诸多管治视角下的难题被确切地界定为:“传统的(管治)方法可能想通过整齐的国家—市民社会—国际组织及其区分,通过科学技术知识,通过基于有限观察的统一性解决方式和风险评估,来维持这个世界可以实现管理的神话……尽管这种神话至少在短期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维持一种秩序和控制感,但它常常是一种脆弱的、问题丛生的、虚幻的秩序。”<sup>②</sup>

与此相一致,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国家和管治理论提供了十分有用的分析工具。在这里,国家不是一个中立的实体,而是一种“社会关系”。所以,国家和管治方式的结构与行动,不能由它们自身来解释,而是应当考虑社会实践和社会力量、变革中的社会环境、社会再生产中国家争议性的职能或任务、规制方式的其他维度和社会经济再生产的形式,即历史上具体的积累体制。

虽然国家和管治不仅仅是资本或主导性社会力量的工具,但仍需要从其所处的社会关系中理解它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需要揭示的是,国家政策和管治作为现代社会的结构性展现,具有明显的统治力量支配性特征。不可持续的结构和进程,深深植根于国家机器、人事和规则、运作观念和知识、实践方式中。这里指的是社会和国家政策或管治的共构性特征,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政治经济。

不仅如此,要想理解既存的社会构型和动力,需要注意到,国家在为各种利益和社会力量提供某种耐性,在形成最终形式的妥协、联盟和可能的霸权方面,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生产关系中,国家还通过教育和分配个人角色等方式,划定斗争的多维空间。所以,国家是一个核心地带或“战略性领域”,可以通过其行政力量、法律和规制、话

语和合法性、物质和非物质资源等,来稳定或改变各种力量之间的关系与妥协,从而处置各种冲突并促成共识的达成。<sup>③</sup>

基于上述意义,德国全球气候变化顾问委员会(WBGU)关于转型的报告中国国家中心和唯意志论的声明表示:“这是政治,傻瓜!”可以被置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中考虑:当从不同的(世界的、国家的、地方的、地方间的)层级把国家视为涵盖社会力量、权力关系、话语和文化政治经济的社会的一部分时,国家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力量关系,或者更精确地说,是这种社会关系沿着阶级和阶级派别的物质化展现”。

上述理论视角有助于我们深化在转型争论中对国家和管治、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的理解。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国家形式,使某些策略、利益、联盟、行动方式居于特殊地位,并与不同国家机器中的某些行为和权力方式相交织。而且,在危机时期和霸权机制衰弱时期,国家作为约束性角色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我将转向霸权概念。转型的可能性和障碍,需要在不同程度上被广泛接受的日常社会关系的背景下理解。在这一点上,葛兰西的概念会有所帮助,因为他正是要致力于发现“统治”的普遍化(非均质化)的社会经济、政治、观念的类型和机制。葛兰西试图深刻阐明“互相关联的社会意愿达成协议”的复杂机制。德国全球气候变化顾问委员会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生态价值观的

① 尤其对于在法国开展的、始终由经济学家主导的争论来说,很多关于规制理论的著述都低估了国家和管治作为特殊社会关系的作用。通常,国家被视为一种有别于其他的制度形式。

② M. Leach, et al., *Understanding Governance: Pathways to Sustainability*, Brighton: STEPS Centre Working Papers, 2007, p. 24.

③ 葛兰西和普兰查斯(Poulantzas)专注于国家的阶级特征,但他们的概念化理论可以扩展到比如性别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这些领域。

世界性转型。相比之下,规制主义和葛兰西主义的视角除了关心工业主义化石燃料问题,更多地关注社会和生态问题,比如帝国式生产和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得到了强化。而且,考虑到资本主义积累和商品化的动力机制,我们便能够更好地理解,为什么环境政策和环境政治试图给予“市场机制”以特权,来应对环境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葛兰西主义的“被动革命”概念彰显了如下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权力关系下,处理一种或多重危机的方式与现存的社会关系相一致。“被动性元素是指,将从属性的利益吸纳其中,但仍使其维持在次等的、无权力的地位上,吸收知识分子和领导人进入权力集团,但剥夺他们在次级上的领导权……权力集团的决定性职责,不是消除或解决矛盾,而是管理矛盾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这样的霸权概念,不是要求某种秩序的稳定,而是寻求解决矛盾的方法。”<sup>①</sup>这种从战略和权力维度对转型概念的阐述——或者更恰当地说,对于其面临的巨大阻力,在转型争论中普遍缺乏。

综上所述,笔者试图阐明一种基于全面的社会理论基础的批判分析性转型概念。笔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概念、规制理论和霸权理论、国家和管治理论等,为阐释这一概念提供了必要基础。

### 三、政治生态学和社会-自然关系的规制

正如本文开始所强调的那样,面对社会生态危机和问题,“转型”这一概念已变得日益重要。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学尤其是其中的“社会-自然关系”概念,可以为我们提供深刻的洞见。

批判性转型概念的出发点,是对政治经济的生态学批评。这种批评认为,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在本质上由劳动来调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特殊的形式:使用价值为了交换价值或利润而生产;资本、雇佣

劳动和其他劳动之间的劳动等级划分。此外,就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关系相分离的现代国家的发展。“自然殖民化”是所有人类社会的趋势,但在资本主义的主导性生产方式下,这与商品化的强烈趋势相联系。

在本体论层面上,政治生态学打破了社会与自然之间的二分法。依此,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世界历史性难题,根本上不是社会对“外在自然”的资源、生态系统和污水池等方面的影响、过度利用,甚至摧毁。这同时也是生态经济学所持有的主要系统性观点,尽管它将环境视为涵盖社会和正规市场经济的整体。但从政治生态学的视角来看,自然是以社会的方式——比如社会经济方式、技术方式、文化方式和政治方式(制度方式)——构成和占有的。被着重考察的往往不是“环境空间”“星球边界”,甚至不是对资源、生态系统和污水池的过度利用,而是对自然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父权制式的占用,比如食品和居住、交通和交往、健康和再生产这样的社会基本需求,如何通过这些方式来满足。相应地,对自然和(或)“资源”的使用和支配,对社会关系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这并非否认生物物理过程的物质特性——因为这些过程在特定条件下将不再具有再生产能力,并会导向严重危机。然而,尤其在人类纪中,它们被社会及其特殊的组织形塑并处于危险之中。<sup>②</sup>反过来,自然的物质性也会塑造社会进程。

对于社会生态危机来说,与规制理论和霸权理论相一致,需要指出的是,稳定的社会

<sup>①</sup> M. Candeias, *Passive Revolutions vs.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Commons-Conference in Rome on 28/29 April, 2011 organized by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Brussels, pp. 2-3.

<sup>②</sup> 政治生态学强调,对生态难题的阐释本身就是一个非中立的、包含着霸权意蕴的过程。像“星球边界”这样的概念,就构成了一种特殊的视野,在这种视野下对某些难题的特定阐释以及应对更加成为可能。

关系和危机之间没有清晰的分界。自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资本主义、父权制、帝国式生产生活方式就以毁坏自然作为获得稳定和霸权的代价。然而,由于其环境上不可持续性的特点,社会-自然关系却是相对稳定的——尤其是在福特主义时代。像资本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国家这样复杂的社会制度,确保了某种破坏性社会-自然关系的形成与霸权。社会规制——在应对矛盾的意义上而言——对资本主义的社会-自然关系来说是可能的,并且确实存在。这其中的关键是一种政治动力机制。

当前,许多难题的核心在于工业-化石燃料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福特主义引发了大规模的生产和消费,而这种或多或少保持稳定的社会共识与福利制度,在北方国家中仍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在南方国家中也是如此。正是这样一种构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福特主义造就的环境毁坏性和社会经济上有吸引力的构型——是当前转型争论的主要推动力。

因而,批判性转型概念的主要观点之一认为,对社会-自然关系的资本主义规制,并不意味着日趋破坏性的自然占用的消除。然而,自然的毁坏未必会成为资本主义面临的各种紧迫问题中的一个,因为那些危险的消极影响可能被部分外部化和暂时延期。这尤其表现在气候变化中:许多消极影响发生或即将发生在那些脆弱的领域和未来,但这并不会立即导致对资本主义的基本结构和发展动力的质疑。

综上所述,笔者试图表明,社会生态转型的概念化——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及其他视角的转型,可以从政治生态学中受益。因为,它可以为我们提供对于社会-自然关系的动力机制尤其是对转型“客体”的更好的理解。特别是,“主体”和“客体”、社会 and 自然,更确切地说是社会-自然关系的共构性特征。最后,政治生态学坚持认为,现存的主导性社会-自然关系与各种形式的社会统治相关。

这就为一种对转型的规范性理解奠定了基础,它意味着对不同支配形式,包括主导性社会-自然关系的科学与实践的批判。

#### 四、结 论

围绕转型的争论,试图根据构想性和战略性的主张分析当前和未来的变革。然而,这种主张不应取代致力于理解当前社会动力和社会-自然关系的艰苦的理论和经验性工作。笔者并不认为应当回避构想性、战略性的主张和动机,而是认为,这种分析具有让现实适应预期结果的风险,却忽视了深刻内嵌着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主体性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和偶然性,而后者正是需要改变的。

对社会与理论的反思和相关的时间性诊断,并不能直接对政治战略的发展作出贡献。然而,它们有助于更精确地理解结构性约束、矛盾、社会再生产的困境,以及霸权统治的难题和可能的终结。笔者提供了一些实例,并分析其面临的挑战。

前文的阐述打破了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的关于可持续发展的二元化对立。分析具体的霸权形式和资本主义的规制,意味着要思考那些替代性路径(从上到下和从下到上)何以系统地减缩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现代化的形式。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像经济绿化和绿色资本主义这些计划,能否通过改变能源和资源基础来引领一种新的积累动力机制,它们是否可以不仅仅是消极的革命。毕竟,资本主义金融市场的权力结构、利益和机制依然存在。穆拉迪安(Muradian)等人提出,尤其是新经济中心的经济动力机制,“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一个历史性阶段的开端”。<sup>①</sup>

<sup>①</sup> R. Muradian, M. Walter & J. Martínez-Alier, *Hegemonic Transitions and Global Shifts in Social Metabolism: Implications for Resource-Rich Countri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 22, No. 3, 2012, p. 559.



批判性社会生态转型概念,意味着要分析(实践上批判)多重复杂的社会支配形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生态转型的难题或困惑在于,一种全新的——可持续、民主、公正和自由的——世界必须借助于现存的社会(再)生产和支配形式来实现,并在其中实现对后者的超越。正如马克思在其《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的开头中提到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他强调,一个新的世界将会在对“旧”世界的(实践)批判中产生。从更具体的层面上讲,社会生态战略必须要做到超越现状,并提出“深植于具体改革”,但又能够“使试图通过消极革命来掌控变革的策略无效化”的进步的替代性方案。

关于替代性方案和相关实践的争论,在

过去几年中变得激烈起来。生态社会主义的观点和战略拥有悠久的传统,其重点之一是对越来越集中化的生产方式、资本积累规则和把自然视为被征服对象的全面掌控。

我们没有,也不应该有一个宏大规划,但可以像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一再强调的那样,谨慎地对待各种替代性方案,并且依据原则一致性将其合理排序(比如将紧缩政策还是绿色经济视为应对危机的唯一途径)。这就使得我们可以把对已有的、形成中或期望的替代性方案的分析相互联系起来。因此,上述理论视角下的转型概念——包括对性别和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结构与进程、社会-自然关系等的看法,并非无视现存的或可能出现的非(后)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形式(借用政治生态学的语言,就是“社会-自然关系的多重性”)。

(责任编辑:祝伟伟)

※

※

※